

---

# 浙江地区佛教海洋文化述评

粮荻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历史上, 由于浙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佛教在浙江地区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不仅涌现出众多高僧, 而且佛教信仰在民间也影响深远。丰厚的宗教基础, 为今天我们研究浙江佛教的海洋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 漫长的海岸线为浙江佛教的海洋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人们依海而居, 借助海洋开展经济、文化生活, 衍生出众多独有的佛教海洋信仰, 同时也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性, 挖掘其中适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 将丰富性转化为现实可塑性, 对浙江佛教文化, 甚至是浙江经济、文化的整体提升,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浙江; 佛教; 海洋文化; 海洋观; 佛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6)05-0041-05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它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 海洋文化所涉范围也不出此外。佛教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思想, 具有独特的海洋观, 通过研究佛教海洋文化, 能够为我国未来的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启示和借鉴, 繁荣海洋文化, 其中, 海洋观是海洋文化的内核。

## 一、佛教海洋观的内涵

何谓海洋观? 这是我们探讨佛教海洋文化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广义言之, 观可以析出两个层面, 即能观和所观。所观是指从海洋的特性中激发出看待海洋、世界的看法、观点、智慧, 揭示海洋运动的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各种理论体系, 重心在海洋, 类似世界观; 能观即运用这些理论体系来探讨人们如何科学地认识海洋, 遵循客观规律、解决人们在面对海洋时遇到的问题, 重心在人, 类似方法论。从这两个层面出发, 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海洋, 并合理、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开发海洋。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概括海洋观, 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 并逐步发展出海洋权益观、海洋法观、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等理论, 但单纯从人——国家层面观照海洋, 难免缺乏一定的超越性, 势必陷入工具理性的窠臼之中。而工具理性特点之一就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与当代多元化的世界体系是不相应的, 或者说, 要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革新对于海洋观的认识, 当务之急, 就是转变海洋观。革新意味着反思前人、创新观念, 但又不是凭空想象, 需要我们在人类已有的智慧基础上, 挖掘和改善思想理论, 为今所用。现代性的海洋观, 其实质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 而革新的目的就在于激发东方古老文明的丰富智慧资源, 使其焕发当代活力, 特别是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 破除西方一元论的话语体系, 建构全新的、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海洋观, 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要求, 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那么, 何谓佛教海洋观呢? 在佛教典籍中, 记载着大量有关海洋的观点和看法, 包括中国僧人在内的许多佛教学者都曾对海洋、或借助海洋表达他们各自的理论。在他们如何看待海洋、如何分析海洋、如何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观点中, 蕴含着丰

---

**收稿日期:** 2016-06-08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佛教向度内浙江海洋文化研究”(2013Z35)。

**作者简介:** 粮荻(1982), 女, 辽宁本溪人,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

富的先人智慧，对我们现代人处理海洋问题、运用全新的海洋观，具有极其宝贵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非常值得开发的思想宝库。总的来说，佛教海洋观就是佛教理论中揭示出的关于海洋和海洋思维的发展规律、观念态度，以及借助其理论价值和社会功能来利用和开发海洋的思维和方法。

## 二、佛教海洋文化的形成背景

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受制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也就是受历史视域限制。西方海洋文明诞生的地中海地区，海陆交错、港湾纵横，近海多是波涛平静，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人们从事着海上贸易活动，创造出地中海地区发达的航海业和商业文明。泰勒斯通过对自然和生活世界的观察，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的哲学宣言，这绝非偶然，他所在的地区就是被海水所包围的环境。海洋环境不仅激发了古希腊哲学这一人类伟大的文明成就之一，而且成为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海洋对于西方人来讲，不仅意味着生存层面的“靠海吃海”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商品贸易，更是思维方式的塑造。海洋的每一次发怒、每一次平静，对于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而言是多么的神奇和恐惧，并激发了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无限遐想，借助于埃及和巴比伦传来的历法、度量衡、算数、天文等知识，人们开始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预测自然规律及其外在现象，海洋并非变幻莫测，人类通过智慧是可以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进而产生出冒险型、开放型的海洋文化。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常常与海神波塞冬为敌，并屡屡战胜了他；而当奥德修斯通过人类的手段完成了返乡之旅，意味着人类已经异化，不再满足于认识和利用海洋，转而开发甚至破坏海洋，工具理性的端倪由此显现。

相应的，传统意义上，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三面内陆，只有东面靠海。广袤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先人们依靠农业足以为生，而且四时交替的规律相对来说更易于掌握，如此稳定性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相对内敛和封闭的文明形态，进而影响到了海洋文化。“在他们（中国）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sup>①</sup>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对于先祖来说，只是勾画出了陆地的界限，却没有引起积极的向外的求知欲；通过应对海洋而唤醒的文明之光，并没有引起中国人足够的重视。相反，我们把海洋当做大陆的延续，对海洋的认识多集中于“海产之利，鱼盐并重”的物质生产，束缚了海洋观念的发展，尤其到了近代，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以至国力和观念皆落后于西方列强。冯友兰曾说：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当“天下”的范围局限于“四海之内”时，从古人对于海洋的认知中我们可以觉察出，天下重在内而非外。

不同于中国，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拥有三面环海的半岛型地理环境，可以说既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相比之下，对于海洋的认识则更加深入。据文献记载，古印度人的活动范围涉及到陆地、海洋等大面积领域，已然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文明成就，关于海洋的自然知识就包含天文、地理、大气等方面。半岛深入印度洋，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便利的航海自然条件，五千年以前，印度人就学会了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四周的亚非各国，可以说，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佛教思想在创立伊始就包含了海洋因子。在古印度人的宇宙观中，大地是一个半圆球，驮在四头大象的背上，大象居于一个巨龟之上，巨龟则遨游于大海之中。在佛教的宇宙观中，脚下的大地同样置于海洋之上。我们居住的世界名“娑婆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环绕着须弥山周围，统称为“九山、八海、四大洲”。其中，“七香水海”作为须弥山的内围，统称为内海，俱是香功德水；第七重金山（持地山）山根外环绕着弥天一线的大咸海，《涅槃经》中借用大海的八种不思議性质来形容涅槃，如渐渐转深、深难得底、同一咸味……万流大雨入海亦无增减。由此可以推论出，原始佛教对于大海的描述，是忠实于印度的地理环境，限于当时科技条件，又为海洋添加了更多神秘色彩。换句话说，这种神秘色彩移植到了佛教本身，使佛教从海洋中汲取了智慧资源，将对自身有限性的否定依托于无限性的精神，充分地表现为佛教作为宗教的超越性，同时，外在的超越性返归于自身与对象，弥合二者的裂痕，最终实现自我与海洋的和解，从而形成佛教特有的海洋观。

## 三、浙江地区佛教海洋文化的形式和特点

历史上，浙江是中国佛教发展最盛的省份之一，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使得佛教在浙江一

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众多高僧,而且佛教信仰在民间亦影响深远。丰厚的浙江佛教历史和广大的信众基础为今天我们研究浙江佛教的海洋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此外,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为浙江佛教的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人们依海而居,借助海洋开展经济、文化生活,衍生出众多独有的佛教海洋信仰;同时,也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根据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性,挖掘其中适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将丰富性转化为现实的可塑性,对于浙江佛教文化,甚至是浙江经济、文化的整体提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 (一)浙江佛教高僧的海洋思想

历史上浙江高僧辈出,许多僧贤如智顗、澄观、净源、法钦、道悟、印光、弘一等大师在解读经典、指导修行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海洋文化的思想。我们择取对中国佛教史影响深远的智者大师为例,一窥其海洋玄思之妙。

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5)进入浙江天台山,建寺修庙,潜心修行,将天台佛法发扬光大,终生著书立说,有天台三大部、五小部流传后世,世称“智者大师”,所建之寺亦赐名国清寺。在智顗的《摩诃止观》中,将海洋的属性寓意于法理之中,使不可思议的妙法通俗易懂。(1)海洋之广大无边。佛法亦如此,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穷,众生皆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选择迈进佛法的方式,但以“信”为前提,“云何生疑耶?若疑法者,我法眼未开未别是非,凭信而已,佛法如海唯信能入”<sup>②</sup>。信仰超越性的对象,犹若步入佛海的第一步,获得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2)海洋之通行无碍。与陆地之山林阻隔不同,海洋宽阔无边,无障无碍,而初学之人首先要了解的便是诸法性空的道理。《华严经》以日出时光线照亮大地的过程揭示悟道的次第性,“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次照平地。平地不定也,幽谷渐也,高山顿也”。智顗引《大般若经》“人在大海浴,当知是人已用诸河之水”来说明,沐浴佛海就意味着明了空慧的第一性地位,“菩萨所现之相一切皆空,如海慧初来所现一切皆水,介尔念起,所念、念者无不即空,空亦不可得”<sup>③</sup>。以空破执是大乘佛教的传统思维,既知万法皆空,便不会陷入我法二执,“偈云:不贪着色身,法身亦不着,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虚空。劝修者,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令无能为我作师者。于此坐不运神通,悉见诸佛,悉闻所说,悉能受持者。常行三昧,于诸功德最为第一”。(3)海洋之甚深能藏。海洋不仅宽广,而且能够含藏一切事物、彼此不相妨碍。智者大师以海洋能藏之量说明空假二观所藏之无碍。真空不碍假有,俗谛不妨空谛,如万川入海不相滞碍;同时,入海仅是入定之初,不能满足于空假两观的互不干扰,更应推进至空假的融合,契入中道圆融的境界。“空假两观知苦断集犹如枝叶,所未知断喻若根本;空假两观修道证灭犹如灯炬,诸山幽闇力不能明。虽修两观誓愿未满,譬如百川不能溢海。如此相好有如彼福德,知相体知因果知相业,一一法门照达明了,深解相海而无疑滞,定心怙怙亦不动乱,安住此定渐渐转深。”[2]这便是修行圆顿止观法门的关键所在,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众生界与佛界并无本质差别,苦集在当下,灭道也在当下。(4)涉海之放生功德。智顗认为,一心通修止观,便会自觉地以海洋为导师,利益通达一切事物,为此,他曾本着佛教信仰的原则,引导天台附近居民转变生产方式。临海居民多以捕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智顗慈悲心顿现,不忍见众生之间彼此相害,便教化当地居民放弃捕捞水产,并四处化福缘,所得众多,堆砌成山,他以此买下作业海域,改造为放生池。当时统治者听闻此事,又下敕严禁在此池中采捕,并在旁树立石碑以示后人,至唐贞观年间亦无人敢犯。

总结智者大师的海洋思想,不难看出,由海洋所特有的纯洁、广大、甚深、一味等的性质,可以延伸出信仰、平等、慈悲、圆融、和谐等众多海洋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析出民众看待佛教信仰的态度,以及其在日用生活、生产中的影响痕迹。

### (二)浙江沿海地区民间佛教习俗

浙江海域是我国海洋文明发迹最早、海洋文化底蕴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观音、海神等佛教信仰影响巨大。我们研究佛教沿海地区民间佛教习俗,包括观音信仰的地位和民间佛教习俗,以揭示出浙江沿海地区佛教信仰中蕴含着的海洋因子。

1.观音信仰。普陀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岛上“不肯去观音院”所供奉的观音像,相传始于五代,日本僧人慧萼从五台山请来观音像,为大风所阻,停留普陀,风浪延续数日,慧萼无法,只得将观音像寄放于一户张姓人家,

东渡回国。从此中土传言，大风系观音菩萨不肯去日本所造，故此，普陀开始供奉观音菩萨，并形成了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院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因与海毗邻，故有海天佛国之称。1997年，观音跳山岗上又建造起高达33米的南海观音立像，山转峰起、秀林葱郁、紫竹相伴、潮音频传，吸引着海内外香客、游人纷至沓来。此外，浙江海域有着中国重要的东海渔场，经历了千百年的渔业生产，渔民们在与险恶的海洋环境斗智斗勇的同时，祈求航运平安丰产的心态促使观音信仰在浙江海域的流行。《法华》有云：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依此可见，护航成为观音信仰的一大职能，航海之人多有唱念观音名号，以求平安，鉴真东渡时便有此举。

2.民间习俗。因受佛教影响，浙江临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民俗，并沿袭下来。春节时期，天台城乡的早餐名为五味粥，此粥以白米、红枣、豆腐、番薯、芋艿等食材合煮而成。此粥原出于佛寺，新年伊始煮食五味粥，象征着祈求新年“五福临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盂兰盆会是源于佛教的古老习俗，中原从梁代开始仿行，浙东的盂兰盆会会特请长辈念经，哀吊亡灵、为生者祈福。东海的渔民称渔船为“木龙”，因为龙在海上能够除妖驱邪、抵御风浪，乘木龙航行在海上进行渔业捕捞，可以平安、丰收。由此，喝庆贺木龙“赴水酒”便成为浙江沿海渔民的习俗，赴水也有富庶的谐音。在新船造好后，一定要举行祭祀诸菩萨、海神的仪式，之后邀请亲朋好友共饮祈求平安吉祥的喜庆酒。

由此可见，浙江沿海地区所流传的民间佛教习俗，深受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观念上依然遵循着重视民生的功利性思维，佛教文化的性质更多地体现为祈求超自然力量的护佑，海洋作为生存或征服的对象而存在。

### (三)浙江海域环境对中外佛教交流的影响

由于佛教在浙江地区的兴盛，引来全国甚至周边其他国家的僧众纷纷前来参拜访学，而浙江的海域环境又为中国佛教与外国文化往来交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通过梳理中外佛教交流的大事件，如鉴真东渡，彰显出浙江海域环境对于中国佛教的向外传播并推动佛教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

鉴真东渡是中日佛教史上的大事件，它对中日佛教的交流以及佛教在本国的发展影响深远。鉴真六次东渡，三次途径浙江海域；第一次东渡以“将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为借口，实行渡海计划；数次受邀请赴浙江一带讲律，“依次巡游，开讲受戒”。鉴真因东渡经历、弘法志向，与浙江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在浙江地区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痕迹。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曾经六次尝试东渡日本，但只有三次真正出海，而此三次皆路过浙江海域，其中两次明确提及舟山群岛。“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漂浪波击船破，波击舟破，人总上岸。”<sup>⑧</sup>第二次东渡因长江江面飓风、雷雨和恶浪的侵袭，船毁物散，性命堪忧。重新出发进行第三次东渡后，“下至大坂山泊舟不得，即至下屿山”，至此鉴真的东渡旅程第一次与浙江相交，共在舟山居住一个月。起航后又因风急浪高，船只触礁，被渔民搭救，水米相济，后由明州（今宁波）官府接到阿育王寺，此次东渡遂告失败。天宝七年，鉴真一行再次从崇福寺出发，“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得顺风后，进入浙江海域——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待“好风”，“发至署风山”，又停住一月，有感于此次必能成功渡海，选择个好日好风的清晨，出海起行，经顶岸山，看到了海市蜃楼，正说明“去岸渐远”，离开了舟山群岛。此次航行向南航行了十四天，到达海南岛南端，第五次东渡失败。天宝十二载，鉴真开启了第六次东渡，他搭乘日本遣唐使船，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东征传》虽未明确提及浙江海域，但从此次航行的路线来看，出长江口进入东海后，在经往阿儿奈波岛的途中，必然经过了浙江海域，只是航行五天即到达现在的冲绳岛，说明一路顺风顺水，途中并没有停留。

从东渡的路径选择可以看出，当时中日间交往的路线主要有三条，北路沿朝鲜半岛、横渡渤海，登陆山东进入内地。但囿于朝日的紧张时局，这条风险最小的路线变得非常不安全；最南线以法师第四次计划的福州为起点，经黄海、东海，一路向北，因为当时航海主要源于风力推动，对技术和季节的要求都非常高，故而这条最远的路线属费时费力型，归为备选方案；公元8世纪初，在中日双方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国内陆经由舟山群岛，横渡东海到日本冲绳的中线被开辟出来，风险虽大，但耗时最少，鉴真以五天的时间成功东渡恰好说明了此点。以此佛教大事件为线索，也验证了浙江海域环境对于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往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海洋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完成了鉴真赴日、中日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命，其中体现了鉴真顽强不屈以及追求纯真精神的个性，恰好与现代海洋观之求知、开放的要求相契合。

#### 四、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内陆文明形态必将向海洋文明形态发生偏移。大力发展海洋文明既是适应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要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预见，21 世纪将会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纪、将会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甚至争夺势必日益激烈，此间的风吹草动都将牵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近年在我国东海、南海等领域发生的两起海权争端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经济、技术、文化、国防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又是通过浓缩的文化，即软实力的竞争方式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各种文明之间不同的海洋意识、海洋思维、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的汇集，决定着这场竞争的格局、态势，甚至是最终的成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从现实层面考量，研究佛教海洋文化也可以为解决当下所面临的海洋问题，获得崭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这正是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文化建设层面的必然要求。将佛教思想应用到海洋文化的建构上来，牵涉到诸多问题的探讨，比如人类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原则（放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看待万物等命题。这些都是人类在进入现代化之后面临的最为棘手、也是最为重要的难题。理论层面的探讨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上述几个问题又可以具体为人类如何面对、利用海洋、人与人（国与国）如何分配海洋资源、人类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做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国当下面临的现实性挑战。

2014 年 6 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演讲，讲话中指出：“海洋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商品、资本、人力突破地域限制，逐步形成全球贸易网络。不断发展的海洋交通，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开发利用海洋空间、海上资源，已成为沿海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当然，海洋既为人类增添福祉，也带来诸多共同挑战。无论是维护海洋安全，还是保护海洋生态，任务都相当艰巨。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大海。”<sup>④</sup>浙江佛教的海洋思想包含了真如一体的宇宙统一论、众生平等的生命慈悲观、因缘和合的世界和谐论和共存共荣的佛国净土论等命题。系统、整体地研究和阐述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再现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精华，揭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之于西方海洋文化的突出特色和价值体系，在现今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维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文明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们应该更加积极有效的展开对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研究，这些对于优化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绿色型节能型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①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93.
- ② 智顗. 摩诃止观 [M] // 大正藏. 1911.
- ③ 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 [M]. 汪向荣，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④ 李克强. 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EB/OL]. [2016-02-20]. [http://news.china.com.cn/2014-06/21/content\\_32729596.htm](http://news.china.com.cn/2014-06/21/content_32729596.htm).